

以下為周梁淑怡議員於1月26日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今年的施政報告強調要「以民為本」，繼續貫切「改善施政，提升施政水平」的方針，自由黨是深表贊同的。但要落實這個承諾，其中一個關鍵就是問責制能否繼續自我完善，而當中最需要改善的，就是現時各個政策局和部門之間欠缺協調和溝通的問題。

正如我過往在本會中都強調過，局與局之間的協調之所以是這樣重要，是因為很多重大公共政策內裏都包含了多個政策局所管理的範疇，必須依賴一個可靠的跨部門合作機制，從中協調，方能令政策暢順地執行。例如說，在保護文物方面，的確需要一些新思維，但涉及的可能是民政事務局，規劃地政局和經濟局；在處理特殊學童教育的問題上，會涉及衛生福利局及教統局；另外，在有關處理及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的問題上，雖然對業界的影響非常大，對環保在比例上影響相對有限，但如何使到環境及工商兩個有關政策範疇找到正確的配合，也需要仔細研究。至於近日成為焦點的西九龍發展項目，就更不用說了。

除了政策局之間「橫向」溝通很重要之外，其實負責制定政策的政策局和負責執行的所屬署方，在「縱向」協調上也是很關鍵的，否則就會導致政令不通，令局署之間出現斷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沙士期間和及後在處理緊急預警機制的問題上，衛福局、衛生署和醫管局三方面各自為政，令前綫醫療人員無所適從。

這種局署之間的斷層，是否最終做成了一個現象，就是當政策局制定政策時，在執行上未必能配合，結果上情未能下達呢？另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某些局因為責任太大，可能出現樽頸。我認為衛生福利局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都可能有這

個問題出現，這樣對負責的局長和他管轄的人員，尤其是中上層管理，都是不同平的。

以上所點出的種種問題，今年的施政報告似乎並無提出解決的方法，甚至迴避了這個弊病。自由黨認為，這個問題應予正視，並加以改善，才可令市民對問責制改觀。

除了問責制的問題外，有一點我必須一提。施政報告強調堅決「反對官商勾結，徹底杜絕利益輸送」，但我在施政報告發表當日後的記者會就馬上強調，千萬不要混淆了「官商勾結」和「官商合作」。前者是單向的利益輸送，市民不能獲益，但後者卻是一種有效運用社會資源，達致互惠互補的利民措施。由每年的賀歲煙花匯演到市建局的重建項目，以致施政報告所創設的「攜手扶弱基金」等等，都反映官商合作所帶來的好處。事實上，現時社會上仍然有相當大的空間，可讓官商合作進一步發揮功效，例如自由黨所多次提倡的公私營醫療合作，就可以有效舒緩現時公立醫院的負荷。

我們相信只要政府能實施嚴格的監管制度，官商合作是可以達致一個「官、商、民」三贏的局面的。特區政府是不應該「下下」怕給人「扣帽子」，便因噎廢食，放棄這些能造福社群的措施。況且，要真正做到「大市場、小政府」，當局就應該讓私營市場上的專業人才盡展所長，好好發揮私營層面的靈活彈性，減輕對政府架構的依賴。

主席，其實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就不應該局限於官商之間的合作，而是應該擴闊到官民的資源和人才的配合，令社會的整體共同資源能有效地運用。

話說回頭，在談到官商合作的同時，我也不得不提一提政府在這方面近年來往往有點「過猶不及」，將原本應屬於政府的責任，硬推給商業機構，乘機「卸膊」。例如在興建深港西部通道東連接綫、西鐵南環綫廣東道站等，政府都將這些「豬頭骨」推給商業機構。甚至連建議中的食肆禁煙，都要將第一綫執法權推給食肆管理人，實在貽笑大方。我們認為，政府不應以資源緊絀為由，將一些原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硬推落私營機構的身上，否則政府就是欠了納稅人一個公道。

最後，我想講一講關於中產人士的問題。自從前年七一以來，政府多次強調要照顧中產的利益，多聽其聲音，自由黨也多次促請政府委任更多中產代表進入轄下的諮詢架構。但至今政府只是搞了一個 600 人網上論壇，卻並沒有委任多少中產代表進入各個諮詢組織。而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及中產的部分，也只有象徵式的寥寥幾句。我其實很懷疑政府是否真能做到「想中產所想，急中產所急」。

事實上，據我瞭解，本港的中產階層到現在仍然有怨氣，他們一方面對於政府未能真正體察他們所需而感到氣餒，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於社會上資源的分配愈來愈不均衡，落在他們身上的擔子愈來愈重而感到擔憂，覺得自己只有份納稅，卻無份享受福利。究竟政府除了在施政報告內那幾句例行的說話之外，有沒有一些更實在的方法來吸納中產朋友們的想法呢？很多民意調查都顯示，市民所關注的問題都是以經濟民生為主，民主政制往往是都是排在之後的。但在其他這些重大問題上，政府又可有聽到市民的聲音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以下為周梁淑怡議員 1 月 27 日施政報告辯論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我昨日已經提過，多個民調都告訴我們，香港人最關心的題目，不是政改，而是經濟，但可惜，在本會的討論，我們民主派的同事最關心的卻與大部分香港人相反，若果有注意到我們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就會知道民主派對經濟話題興趣微薄，這是很可惜的。其實經濟之所以會那麼受重視，原因是經濟與民生是息息相關的。經濟不振，就業就無法改善。大家可有注意到，我們有些同事永遠是要政府製造就業。其實這個說法誤導了市民。政府是改善就業的主要力量，但任何社會都是要靠民間和商界發揮其經濟動力，才真正可以製造就業。政府不基於市場的需要，而暫時性地創造一些臨時職位，根本是無助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的。

特首今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要大力推動「文化及創意產業」，作為香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他本人還會牽頭盡快設立一個文化及創意產業諮詢架構。而這亦是我一向所極力爭取的發展方向。

其實特首早在兩年前的施政報告中，便已提出要大搞「創意工業」，當年同樣開列出十一種把文化藝術創意和商品結合的新興行業。可惜，兩年過去了，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可謂「口惠而實不至」。今次不過是加多了「文化」兩個字，希望事情不會因此變得更加複雜，而是真的能夠取得一些具體的進展及成果。

其實，本地電影業界和創作界人士一早便指出，他們最關注的，是作品版權能否受到足夠保障，這比設立甚麼基金更重要。例如近日大家都十分關注打擊網上下載的問題。警方最近成功拘捕了一名透過 B T「點對點」網絡技術非法上

載盜版影片的男子，並提出檢控，這點對業界來說是值得鼓舞的。

但是正當政府高調宣佈首宗打擊網上非法上載活動的同時，轉過頭，又有新的盜版軟件 e X e e m 的出現，據說這種軟件比上一代的更為易用，及更易避開執法部門的追截，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此，當局必須加強這方面的科技知識，務求打贏這場日新月異的高科技「兵捉賊」遊戲，並盡快完善有關法例，加強執法和提高市民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否則，連版權都不能有效保護，又如何發展創意工業呢？

講到經濟發展，自然要談談作為本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的旅遊業。今年可說是旅遊業的豐收年，在港府和自由黨等等不斷爭取之下，內地進一步放寬了自由行到更多省市，令到去年訪港旅客人數創出新高，突破了二千萬大關，達到二千一百八十萬人次，連帶零售及服務業都受惠不少。

隨着迪士尼樂園今年九月落成啓用，相信會將旅遊業的發展推向高潮。我期望特區政府更積極與內地合作，加強推廣和做好配套準備的措施，以迎接大量慕名而來的旅客。此外，我亦十分支持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大嶼山發展專責小組所提出的，將大嶼山打造成一個綜合旅遊中心的構想，例如增設水療中心、生態旅遊等元素，並認真考慮撥地興建專為遊客而設的賭場，希望能進一步帶動旅遊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為基層人士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對於特首肯定政府不會在今後兩年半裏實施銷售稅，我也表示歡迎。但與此同時，又有消息傳來，說有政府官員向傳媒吹風，考慮如何開徵銷售稅，意味著特首的好消息很可能會非常短暫。我想再次重申，如果開徵銷售稅，必定會打擊香港購物天堂及飲食天堂的美譽，而且更會令本港服務業及中小企業付出沉重的代價。我注意到美國商會的新任主席 Mr Jack Maisano，雖然認為香港稅制有改革

的空間，但他也是反對在香港開徵銷售稅的。

另一方面，我也要感謝特區政府在爭取 C E P A 方面所作的努力，因為 C E P A 確實對香港的經濟復蘇，起了積極推動的作用。但我同時想指出，有些方面政府還是做得不夠的，例如未能有效幫助本港服務業，爭取降低進入內地市場的門檻；此外，在協助港商尋找商機，爭取實質合約和項目等方面，力度顯然不足。

事實上，外國政府首腦經常帶同商務團到處外訪去爭取合約，但是本港官員好像常常只會與內地官方搞高層接觸，卻沒有為香港商界爭取到多少合同和訂單。例如剛剛結束訪華的加拿大總理馬丁，隨同他到訪的就有一大班該國的工商界代表；甚至乎正在訪問墨西哥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也帶同了一班國內的國營與民營企業家到當地尋找商機。我認為特區政府好應該效法他們，在給本港商界爭取生意上「加多兩錢肉緊」。

其實 C E P A 是一項互惠互利的安排，特區政府不應被一些不正確的說法影響，不要視向內地爭取開放市場為「求乞」的舉動。我們這樣做實在不是伸手向中央拿錢，而是拿著計劃書，去說服他們香港與內地是有很多地方可以互補和達致雙贏的。何況，全球大企業都對內地龐大的市場虎視眈眈，香港就更不應落後於形勢，而要放開懷抱，積極點去爭取，不要覺得這樣做是「厚顏」。

主席，政府口口聲聲話要創造有利營商的環境，但可惜在立法時卻往往拒絕進行 Regulation Impact Study（規則評估研究），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想立的法是否可行或值得。那麼政府又怎能說服商界，尤其是中小企，當局是真心想促進有利的營商環境呢？我希望政府能定下政策，所有立法都要經這項研究，才能令商界安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以下為周梁淑怡議員 1 月 28 日立法會施政報告辯論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對於剛剛結束的三三四學制改革諮詢，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有些希望能推遲至 09 年或更後才實行；有些則懷疑學制與課程改革應否同步進行，也有人擔心新設的通識科在推行上會否有問題等等。自由黨對於三三四制是支持的；我們也贊成將通識教育列為常規科目。但自由黨和普遍家長一樣，都覺得政府在推行這項改革時，必須確保各項配套措施能跟得上，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教師的質素能配合，令新學制能讓本港教育邁向更高質素的發展。政府在這方面是絕對不能偷懶的。

事實上，本港教師隊伍的質素一向都受到各方的關注，尤其在去年底的一次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試，成績創下自 01 年以來的新低，當中在英語寫作的部分，更有超過 7 成不及格。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警號，當局必須認真檢討對教師的培訓，否則一切的教育改革都是枉然的。

新學制另外一個焦點就是學費增加的問題。但我很相信只要改革能真正切實地提高教學質素，絕大部分的父母都不會吝嗇那些額外的負擔。看看這麼多父母爭相送子女入讀國際和直資學校，就可以知道很多家庭對於投資於子女的教育，是毫無保留的。

自由黨對小班教學的態度是正面和開放的。我們不反對政府在審慎評估資源的運用下，逐步在小學實施小班教學，但大前提是要確保師資的培訓能得以配合。自由黨在這方面的立場是很清晰的，就是任何形式的小班教學都應該是以提高教學質素為目標。如果有人想藉小班來解決其他問題，例如為了舒緩縮班或為超額教師保飯碗，自由黨將會義不容辭地反對。其實政府和有些教育界朋友對推行小班教學所存在的爭議，主要是圍繞培訓與資源運用方面，我希望大家能冷靜尋找共識，基於事實來找尋最能夠惠及我們學子的出路。

另外，在加強提倡「終身學習」和在職培訓方面，今年的施政報告似乎著墨不多。雖然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的確為很多在正規文法中學未能取得較佳成績的年青人，提供了另一條可靠的出路；但是對於中年失業人士的再培訓，透過僱員再培訓局所出來的效果似乎未如理想。現時全港廿二萬七千名失業者當中，40歲以上的就佔了差不多一半。我認為政府必須認真地檢討協助中年人士就業的措施，設法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我想借這個機會，提一提關於挽留人才的需要。今年施政報告花了不少篇幅去闡述本港的人力資源出現錯配；又強調要把握內地的強勁增長，發揮本港與國際接軌的優勢，為國內企業和資金提供支援服務，幫助它們「走出去」。我必須指出，香港應該要輸出的是一整套的服務，而不是我們的人才。我這樣說，是因為我發覺曾經在80年代出現過的所謂人才外流（brain drain）問題，似乎又再重臨香港。

事實上，由於近年本港鄰近地區的發展迅速，求才若渴，很多包括從事物流、酒店管理、建築設計、融資財務，甚至資訊科技等行業的中層管理人才，都已經被國內、鄰近地區，甚至澳門等地方「挖角」，而他們願意到外闖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地方能夠給予他們香港所不能提供的機會。要訓練中層的管理人才並非一朝

一夕，任由這個情況繼續下去，香港的產業結構很可能會趨向「空洞化」，做成人才被「掏空」，這樣長遠來說只會加深本港人力資源錯配的問題。所以，政府一定要積極協助本港公司發揮本身的優勢，找緊機會向內地和外國企業提供全盤的支援服務，提供足夠的機會給本地的精英在本港發揮。同時，政府在吸納人才方面，也應該放開懷抱，招攬外來的精英來港發展，在政策上給予適當的方便，切忌被保護主義的聲音所局限。不要忘記，香港發展了幾十年，能有今日的成就，來自香港以外的人才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最後，我想講一講關於保留具歷史價值建築物的問題。政府在去年二月發表了《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的諮詢文件，決意更全面地保護古跡，用意是相當好的。但是，我認為在如何處理私人擁有的古跡這個問題上，應儘快定下政策，而無需等候整個諮詢完結才考慮。要知道，建築物一旦拆卸，是無法挽回的。現時的方法就是只顧保存建築物的硬件，但軟件卻不能靈活使用，市民更不能分享。這是不能發揮古跡的社會功能的。我建議兩個選擇：其一，但凡私人擁有的古跡，當局都給予其改變用途的方便，但硬件就要緊隨保護古跡的所有規條。其二，若業主不願意負上長期保護該古跡的責任，政府可以用換地方式收回建築，然後以投標方式換取商界參與，以軟件的商業收益來維持硬件的保護。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